

评深町英夫著《教养身体的政治： 中国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

段瑞聪

一、中国人的“身体”正在受到关注

2013年5月,日本岩波书店出版了中央大学深町英夫教授的专著《教养身体的政治:中国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身体を躰ける政治:中国国民党の新生活運動)。^①该书根据作者过去10年里用日、中、英和韩文(翻译)发表的15篇论文结集而成。该书出版不久,就有日本评论家在《朝日新闻》发表书评,足见该书已受到日本媒体关注。^②

笔者曾经以蒋介石与新生活运动为主题撰写博士论文,并出版了专著。^③关于新生活运动,除了拙著以外,还有关志刚、温波和夏蓉等学者的专著。^④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该书通过“身体政治”这一新视角,重新审视新生活运动。正因为如此,作者将新生活运动定义为:“国民党政权试图通过‘教养’或者‘医治’中国人的身体,来适应现代这一时代的一种尝试”(第9页)。

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史学界兴起身体史研究热。^⑤近年来,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布莱恩·特纳(Bryan S. Turner)等人的著作先后在中国被翻译出版。与此同时,台湾和大陆学者也不断推出有关近代中国身体史的研究成果。^⑥与本书内容关系最密切的当属台湾东海大学黄金麟教授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如论文《丑怪的装扮:新生活运动的政略分析》,台北《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30期(1998年6月),第163—203页;著作《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年版)、《政

① 关于本书之中文名称,笔者本想译成《规训身体的政治:中国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但是,深町教授在自己的文章里译为《教养身体的政治:中国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在此,笔者尊重作者的译法。参见深町英夫《评家近亮子的〈蒋介石的外交战略与日中战争〉》,《抗日战争研究》2013年第2期,第154页。

② 内泽旬子〔书评〕「身体を躰ける政治:中国国民党の新生活運動」,『朝日新聞』朝刊、2013年8月4日。

③ 段瑞聪《蒋介石と新生活運動》,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06年。日本学者深町英夫、小野寺史郎、水羽信男等3位先后为拙著撰写书评。分别刊登在『中国研究月報』2007年5月号(63—64页)、『近きに在りて』第52号(2007年11月、113—117页)、『アジア社会文化研究』第9号(2008年3月、133—136页)。

④ 关志刚:《新生活运动研究》,海天出版社1999年版;温波:《重建合法性:南昌市新生活运动研究1934—1935》,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夏蓉:《妇女指导委员会与抗日战争》,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⑤ 杜丽红:《西方身体史研究述评》,《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3期,第123—133页。

⑥ 苏全有、王海波:《对近代中国身体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洛阳理工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第71—78页。

体与身体：苏维埃的革命与身体，1928—19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2005 年版）、《战争、身体、现代性：近代台湾的军事治理与身体，1895—2005》（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2009 年版）。相比之下，日本有关中国身体史的研究成果还很少。^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该书的出版填补了日本近代中国身体史研究的空白。

二、本书之内容评介

本书由绪论、前篇“主题”（第 1—3 章）、“间奏”（第 4 章）、后篇“变奏”（第 5—7 章）和结论组成。下面将介绍各章主要内容，并适当加以评论。

绪论 “扣好钮扣，请勿吐痰！”

作者在绪论里首先讲到该研究的出发点，即起源于一个普通的疑问。具体来说就是新生活运动何以在国难中发动，并得以大规模且长期推动？作者认为以往研究并没有得出明确的答案（第 7—8 页）。

作者简单归纳了中国大陆及台湾、西方和日本有关新生活运动的以往研究。但是，笔者稍感遗憾的是，作者对于从身体视角分析新生活运动的以往研究成果着墨不多。其中，对于黄金麟和 Ferlanti Federlica 的论文只以注释（第 331 页）形式提及，而对于丹野美惠、Yen Hsiao-pei（严晓珮）的论文在绪论里则完全没有提及。^②笔者认为，作者如果先从正面讨论以身体视角分析新生活运动的已有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和分析框架，再展开论述的话，或许更能突显该研究的独创性。

第 1 章 “苹果的回味——思想”

作者在该章关注蒋介石之日本留学经验与新生活运动的关系，分析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身体美学与近代西方生活礼节之差异。作者认为二者之间最大的差异在于人们在何时何地操作各自的身体，以及由此展示什么样的人物形象（第 53 页）。具体来说，作者认为古代中国身体美学所追求的是人们通过自己的身体，断断续续地确认和体现人际关系的道德理念，而近代西方身体美学则促使人们通过身体，表现和证明其独立人格的伦理美德（第 54 页）。之所以产生如此差异，作者认为有两个背景，一个是对个人与社会之关系认识不同，另一个则是对身心关系之认识不同。

不过，作者在本章“小结”部分指出“国民党政权发动的新生活运动，从本质上必然将中国人民及其传统文化作为否定、诬蔑的对象，而且将与其敌对”（第 56—57 页）。对此，笔者不禁要问，对于新生活运动发动者蒋介石所提倡的恢复“礼、义、廉、耻”等固有道德，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诚然，蒋介石对于传统思想的理解也许有偏颇和不足之处。但是，从新生活运动当时蒋介石发表的演说里，我们看不到他有否定传统文化之言辞。

另外，笔者曾在拙著里对新生活运动之思想背景进行过详细分析。具体来说，除了传统思想、蒋介石的日本留学经历和他的对日认识以外，还有法西斯主义和基督教的影响。作者在本章里谈

^① 石田秀实『こころとからだ 中国古代における身体思想』、中国書店、1995 年；飯島渉『ベストと近代中国——衛生の「制度化」と社会変容』、研文出版、2000 年；遊佐徹『蠟人形・銅像・肖像画——近代中国人の身体と政治』、白帝社、2011 年。

^② 黄金麟：《丑怪的装扮：新生活运动的政略分析》；丹野美惠『民国期中国における『清潔』の希求と『国民』の創出：新生活運動の婦嬰衛生工作からみえるもの』、『立命館言語文化研究』第 10 卷 5・6 合併号、1999 年 2 月、85—102 頁；Yen Hsiao-pei, “Body Politics, Modernity and National Salvation: The New Modern Girl and the New Life Movement”, *Asian Studies Review*, June 2005, Vol. 29, pp. 165—186; Ferlanti Federlica, “The New Life Movement in Jiangxi Province, 1934—1938”,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44, No. 5, September 2010, pp. 961—1000. 关于丹野、Yen 论文，作者在本书第 5 章（第 189 页）有提及，但是没有就其视角进行分析。

到传教士的活动,但是并没有从思想方面展开分析。

第2章 “星火燎原/乐队马车——政治”

该章分析了国民党政权的派系斗争与新生活运动的关系。笔者在拙著里通过分析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干事会、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干事会之成员结构,指出新生活运动之领导力量主要由三民主义力行社、政学系、东北派和基督教有关人士组成。与此相对,作者分析了南昌行营中的黄埔系和政学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中央的拥蒋派(主要是CC派)和非蒋派(西山派、改组派),以及作为地方政权的山西(阎锡山)和四川(刘湘)对新生活运动的认识与反应,有助于读者对国民党政权派系斗争进行全面的理解。

作者认为,蒋介石通过煽动心腹各派(黄埔派、CC派、政学系)之间的竞争,成功地获得了他们对蒋本人的忠诚。但是,笔者认为派系对立影响了新生活运动领导机关的人事,削弱了组织的凝聚力,其结果导致了蒋介石权力基础的不稳定(拙著第118页)。

第3章 “蒋介石的新衣——社会”

该章所关注的焦点是新生活运动对身体之教养如何设计和实施、当时中国社会之反应如何。当时,正中书局发行一套新生活丛书,预计出版41册。作者认为该丛书反映了国民党当局的职业观,所以在本章以银行职员、店员和农民为例,分析了普通民众对新生活的反应。但是,在众多的职业集团中,作者为何只选择了上述3种职业,文中似乎没有明确的交代。诚然,关于工人、政务官和公务员的丛书似乎没有出版,选择上述3种职业也许有不得已之处。但是,蒋介石在发动新生活运动时,将国民党党员、军官、警察、学界(教育家、校长、学生)视作推行运动的主要力量。笔者认为,作者有必要对上述这些职业进行分析,这样才有助于理解当时国民党政权所设计的“理想的国民形象”以及社会各阶层对新生活运动的认识和反应。

不过,作者通过分析新生活运动当时的纠察活动,指出人们对新生活运动持阳奉阴违的态度,认为基于权力的他律的、暂时的和断续的监视是很困难的事情。所以,作者借用“皇帝的新衣”这一典故,将本章命名为“蒋介石的新衣”,以示社会对新生活运动的态度。

第4章 “敌乎?友乎?——日本人”

本章考察了新生活运动当时日本外交当局和民间舆论对新生活运动的认识。作者认为,日本外交当局并没有理解新生活运动试图通过“教养身体”创造国民、建设国家的本来意义,而是对蒋介石本人或者新生活运动排日之侧面加以警戒。另外,日本民间舆论对新生活运动则是褒贬不一(第179页)。具体来说,民间舆论基本上是以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稳健与激进、亲日与反日、独裁与民主这种二元论的方式来看待新生活运动的。基于此,作者认为无论日本外交当局还是民间舆论,几乎都没有对新生活运动模仿日本、进行身体教养的意义进行慎重而详细的分析,仅仅从对日本自身的直接的、短期的利益得失来判断该运动的性质(第181页)。但是,客观来讲,当时身体美学这一概念尚未完全渗透日本社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者对日本外交当局和民间舆论的批评也许有点强人所难。

第5章 “谁教养孩子?——家族”

本章分析了女性在新生活运动中作用的变化。作者认为新生活运动开始时,女性的作用被认为是保持家里整齐清洁,培育勤劳健康的现代国民。但是,中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权为了最大限度调动人力资源,开始提倡女性走向社会,开设托儿所(第225页)。但是,笔者认为,开设托儿所不仅仅仅是为了让女性走向社会,积极参加战时动员。从培养现代国民的角度来说,有必要加强公共教育。

第6章 “谁为国捐躯?——军事”

作者在本章以伤兵之友运动为例,探讨其在新生活运动中的意义。作者认为,“伤兵之友”运

动的目的在于“医治”在前线受伤而被送往后方的底层民众的身体，慰抚他们以免成为扰乱社会秩序的因素。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同样在战场负伤的日本兵的“医治”是否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呢？再进一步讲，救死扶伤只用“医治”身体来解释是否恰当呢？

第7章 “奢侈的保镖？——美国人”

本章讨论了新生活运动战地服务团与美军义勇队士兵的身体（卫生、营养）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美国人重视卫生和营养，不仅是其经济水准的反映，也不仅仅是因为其尊重个人人权的观念，主要是为了保持将士健康，从而使其发挥最大的战斗力。与此相对，中国方面则是为了维护其作为“宽厚的主人”的面子而煞费苦心。诚然，中国方面热情接待美军的确有维护面子的因素。但是，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中国为了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进而获得美国的更多的支持。所以，如果仅从身体美学的角度来解释战地服务团与美军的关系，将会忽略其政治意义的存在。

结论 “中国人是爱迪生吗？”

作者认为，新生活运动之发动是时代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中国国民党政权为了培养符合国民国家的现代国民，不得不通过自上而下的群众运动“教养身体”，发动并推行新生活运动。同时，作者还指出，1949年以后，对国共两党来说，通过“教养身体”来培育现代国民依然是重要的课题。今天，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不断增强。作者将今日的中国比作爱迪生，认为中国是“将‘富强’作为自己的目的，但是并不尊重个人”的特殊的“后现代”超级大国。中国是否能以其独特的模式实现现代化，令人瞩目。

三、本书的意义

本书是第一本以身体视角来分析新生活运动的专著，值得积极评价。作者早就在其他杂志刊登文章，呼吁“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年轻学者在熟练运用史料的同时，应对其他领域（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尽可能给予关注，从中汲取有用的理论、概念和模式”。作者甚至认为“理论和膏药可以用在任何地方”。^①可以说，作者忠实地履行了他自己的理念。正因为有这样的理念，作者“十年磨一剑”，完成了这样一本学术专著。有心的读者可以发现，作者除了对新生活运动重新定义以外，对“身体美学”（第333页）、“公共意识”（第334页）、“国民国家”（第342页）等概念也进行了定义。作者的这种理论创新精神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近十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达，史料收集变得越来越方便。尽管如此，作者还是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广泛搜集并运用大量日文、中文和英文的一手史料，从而使本书的立论更为坚实可靠。不仅如此，作者能够熟练运用日文、中文、英文和韩文（翻译）发表相关论文，更扩大了其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多国史料的熟练运用和多种语言的自由发表，充分证明作者是当今日本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有力推手。

四、关于本书的几点意见

第一，关于本研究的定位问题。身体史研究是一门跨学科研究，与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性别史、医疗史等领域有密切关系。而“身体”或者“身体政治”正是本书的中心概念。笔者认为，如果作者在“绪论”里对“身体”和“身体政治”加以定义，对中国近代身体史研究现状做一番

^① 深町英夫「理論・概念・模式——理屈と膏薬はどこにでも付く」、『歴史評論』、2003年6月号、15—27頁。

梳理,特别是对为数不多的以身体视角讨论新生活运动的以往研究进行分析之后,再提出自己的观点和分析框架的话,本研究在中国近代身体史研究和新生活运动研究中的定位将会更加明显而有意义。

第二,以“身体”视角研究新生活运动的局限性。本书以新生活运动推行的“伤兵之友”运动、战地服务团的活动等为例,分析了“围绕身体的政治”。但是,本书第2章派系斗争、第4章日本的反应,以及本书没有提及的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所推行的乡村服务、生产事业、文化事业等活动,如果只用“身体”的视角,恐怕不能解释清楚。由此可以看出用“身体”视角分析新生活运动的局限性。

第三,中国国民党与新生活运动的关系。本书副标题为“中国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但是,本书并没有对国民党与新生活运动的关系展开分析。笔者曾在拙著里指出“新生活运动与国民党的关系极为薄弱”(拙著第252页)。笔者认为新生活运动始终是在蒋介石个人的领导下进行的。如果作者认为是“中国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的话,应该向读者说明国民党的身体观到底是什么。最起码应该对《中国国民党员与新生活运动》做一具体分析。

第四,其他政治势力的身体观。众所周知,新生活运动当时,除了国民党以外,还有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政治势力存在。这些政治势力的身体观与国民党的身体观(如果存在的话)有什么异同?比如,黄金麟教授已经对苏维埃革命与身体的关系进行分析。^①广岛大学水羽信男教授在对拙著的书评里也指出“当时自由主义者所构想的‘国民’形象与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所要创造的‘国民’的性质是不同的”。^②如果将同时代的这些政治势力的身体观进行比较分析的话,也许更能加深对新生活运动“身体政治”的理解。

以上是笔者对本书的粗浅理解和评论。若有误解或曲解之处,敬请作者和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段瑞聪,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商学部教授]

(责任编辑:高士华)

^① 参见黄金麟《政体与身体:苏维埃的革命与身体,1928—1937》。

^② 水羽信男「书评 段瑞聪『蒋介石と新生活運動』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06.11)」、『アジア社会文化研究』第9号、2008年3月31日、136頁。